

把握“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深刻意蕴

□ 倪明胜

《花》上映后遭遇口碑危机。某主演粉丝团再度“大发神威”，希望利用“锁场”的方式炮制电影高票房的假象。

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粉丝，正在用他们的真金白银搅动着资本市场，其力量不容小觑。那么，明星粉丝团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逆正常的文化市场秩序？原来，电影票房的高低有可能决定参演明星的商业价值。而一位明星的粉丝数量越多、人气越高，也能为粉丝团带来更多售卖明星演唱会门票、组织各类活动的机会。作为明星与普通粉丝之间的“桥梁”，粉丝团在两极之间谋取私利的行为已不再是新闻。说到底，一条完整利益链条的存在，使有组织的“锁场”行为变得不可避免，正如一位粉丝所言，“每家明星粉丝都有锁场传统”。

问题在于，粉丝团所伪造的虚假繁荣不具备真实性，正在扰乱文化市场秩序。何况，比起经济损失，“刷流量”“刷票房”给文艺界带来的伤害更加深刻持久。过于看重明星所能带来的流量，会促使制作方追捧偶像而不顾其演技和品质。如此一来，明星的身价将会被不断抬高，挤压制作费用，以致影视剧制作粗糙，质量低下。

□ 李勤余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粉丝普遍年轻小、涉世未深，一些追星行为缺乏理性。如2017年为庆祝某偶像明星的18岁生日，他的粉丝计划在美国发射一颗人造卫星。有媒体估价后指出，成本最低的卫星也需花费30万美元。可见，某些粉丝因为对于明星的极度痴迷、盲目追求，已经到了丧失理性、如痴如醉的地步。

有些粉丝团体更有向粉丝煽动狂热情绪之嫌。不久前，某嘻哈明星受到《紫光阁》杂志的批评后，其粉丝误以为紫光阁是一个饭店官微，竟妄图购买热搜话题“紫光阁地沟油”来左右舆论。此事固然令人感到啼笑皆非，但我们更应从其中认识到，一旦粉丝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完全唯偶像马首是瞻，就会颠倒黑白，丧失基本的道德立场。

当然，反对将娱乐宗教化的明星粉丝团，不等于全盘否定粉丝支持偶像的行为。一方面，应该完善业内行规、准则，规范别有用心、谋取私利的明星粉丝团体和个人。另一方面，也应正确引导粉丝，鼓励他们与偶像理性互动，共同向社会传递正面效应。粉丝经济的诞生，有其必然性，但文化市场终究是属于大众的。随着文化、影视行业的不断成熟，粉丝左右市场的力量必将被不断弱化。相信，在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在大众的反思考辨之下，某些粉丝以及粉丝团体的“脑残”行为自然会日渐减少。

(作者系文汇报新媒体部记者)

光明时评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亮见——

远离赌博恶习 树立文明乡风

□ 赵明昊

近日，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在春节前后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将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将农村赌博问题放在春节前后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来抓。

赌博，自古至今都被视为人类社会的一大恶习。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赌博之风渐起，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赌博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而且还直接或间接诱发各类犯罪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对这个问题的治理非常必要，非常及时。

以往的经验表明，春节期间是赌博犯罪的高发期，特别是在缺乏优质文娱活动的农村地区，返乡村民积攒了一年的财富，转眼间就可能在聚众赌博中化为乌有。“赌生偷盗”，越陷越深、负债累累的赌徒还会引发其他刑事案件，最后演变成家庭悲剧、社会悲剧。

必须注意的是，一些人把赌博附会成“娱乐活动”，这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小赌怡情”，防患于未然才是最重要的。赌博不是娱乐活动，也不是智力比拼，而是彻头彻尾的欺人与自欺。一些人群中弥漫的对赌博性质认识不清的言论，是个人价值观上的扭曲，也

是公共文化生活层面衰落的体现。这种认识，也给那些不法之徒造成了可乘之机。可见，从思想根源上肃清认识，让基层群众远离赌博，让不法分子无机可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针对农村赌博这一社会问题的治理，仅仅依靠道德教化和司法力量的干预是不够的，真正的解决之道还在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落实。伴随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发展，一些农村地区在经济上依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文化价值层面也存在着失准、失衡问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乡村固有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发生巨大的改变，基层管理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些人思想上、生活上存在着不适应、不稳定是难免的。这个时候，不良风气和旧有恶习就会乘虚而入。对此，加强管理当然非常必要，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建设优秀乡村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让更多农民富了口袋又富脑袋，则更为重要。

“物不因不生，革不成。”疏堵并用才能解开农村文化发展这个结。需要认识到，在我国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重塑文明乡风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在长效机制上下功夫，努力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才能让群众远离赌博恶习，让良性的乡村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生机勃勃。

“物不因不生，革不成。”疏堵并用才能解开农村文化发展这个结。需要认识到，在我国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重塑文明乡风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在长效机制上下功夫，努力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才能让群众远离赌博恶习，让良性的乡村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生机勃勃。像“村晚”这样

事关人心之向背，事关“赶考”水平之高低。1949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和愿景，带着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历史命题，走上一条“进京赶考”之路。69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带着人民的嘱托和信任，在这条路上努力进取，迎接一个个时代考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在推进“四个伟大”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自身建设已经作为新时代继续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保证，是决定能否向人民交出令人满意答卷的“核心密码”。

正是基于此，在历经十八大以来五年的管党治党实践，在持之以恒整治“四风”，坚定不移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在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不断巩固，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日益净化，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之际，党中央理性审视管党治党来时路，展望未来从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提出要把握“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深刻意蕴，以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显然，这里的“重整”既是对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的总结和凝练，也是按照十九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作出的全新管党治党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行装”既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也承载着我们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程中积聚下来的“看家本领”和“传家宝”；“再出发”是基于新的历史起点，以一种全新的精神状态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须双管齐下

□ 刘永林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释放新时期建设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强烈信号，对各级各类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内容和保障，教师的地位、待遇、培养等指明了方向。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也不例外，不但总体上有教师队伍建设的系统、全面的要求，也专门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需求和社会期待。

双师型教师，就是教师不但要有教师资格，还要有职业资格，横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同时是学校的老师和企业的一线员工，以更好地促进产学研相融。就双师型教师队伍而言，

《意见》明确指出教师队伍建设要“分类施策”，并专门就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如何抓质量、怎样提升计划、校企联合培养、教师资格标准及认定、用人自主权、兼任任教、考核评价等内容，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实践中中长期制约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性障碍。但是，基于双师型教师地位的特殊性、要求的复杂性、培养的困难性、管理的多重性，在《意见》原则性的规定之下，仍然亟待进一步的法律化、体系化、多策并举、落地落实。

构建一套什么样的制度体系和如何构建这样一套体系，直接影响每个教师个体生产力的发挥。产教融合背景下，校企双

制、工学一体，到学生学徒“双重身份”到学生学徒“双重身份”，关键在于双师型教师。双师型教师必须在追求营利性的企业要求和公益性学校中“兼职”或“旋转”，加之行业企业与企业、学校与教师、行业企业员工(教师)与学生(学徒)等错综复杂的权责关系，还要法律化、体系化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制度体系跟上。

深化职业院校、应用型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学校专业规划、教学设计、实习实训等人才培养环节的实效效果如何，取决于双师型教师的素质和水平。应贯彻落实《意见》，秉持“分类施策”原则，建构一整套适应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的双师型教师制度体系。

一方面，期待立法部门尽快落实《意见》，将政策上升为法律或在修订法律时予以吸收。对于双师型教师队伍，最关键的莫过于关于教师资格的标准及其认定需要教师法或教师资格条例予以明确，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打通职教、高教教师与行业企业技术能手、工程师转换或兼顾的一些障碍，并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管理等奠定法律基础。

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就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出台相应的办法、制度化、法律化顶层设计。《意见》的原则性规定为双师型教师制度体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纵向上还需对双师型教师按照中职、高职、应用型高校分层，类型化教师资格标准与认定、培养和管理；在

横向上，由于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涉及产业和教育领域，需要明确行业企业或行业协会参与双师型教师认定、培养、管理的程序和权责。此外，还需政府、企业、学校、协会等主体，在实践中结合实际予以具体化，从而形成制度化的体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作者系天津市委党校副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光明论坛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评论版投稿邮箱

gmpinglun@163.com

“兴趣一代”是社会进步的标记

□ 王言虎

新闻随笔

据报道，近日，58集团联合腾讯发布《2017—2018年度中基层求职者行为特征研究》，对95后新生代求职者进行了专题探讨。该报告显示，“兴趣爱好”已成为95后求职者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求职意向城市的层级来看，一线城市对95后的吸引力在降低，二、三线城市对95后的吸引力上升，占比已达41.3%。

“95后”是以世代来划分人群，这种分析法已成为社会学家观察社会的一个经典方法。这一代人成长于移动互联网爆发的时代，受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精神影响较深，是真正的“移动互联网原住民”。他们注重自我，特立独行，兴趣在人生选择中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

从调查结果看，不仅“兴趣爱好”已成为95后在求职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与其他年龄段相比，95后更看重“情绪释放、自我表达和精神自由”，过半数95后愿意“为兴趣和爱好而工作”，超七成95后愿意“为兴趣和爱好而付费”。

与任何一个世代的人相比，95后呈现出更为开放积极的特征。他们之所以在择业或其他选

择上愿意为兴趣买单，本质上还是追求自我的个性使然。移动互联网开拓了他们的视界，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得以轻装上阵，拥抱生活。

95后出生的年代，互联网刚刚接入中国，但他们成长的年代，却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爆发同步。智能手机为他们社交、购物、观影提供了无比便利的条件，也潜移默化地形塑着他们追求多元、注重自我价值的心智模式。所谓“兴趣主导”，本质上也是以自我为中心，解放天性。

物质生活的充裕，为他们因兴趣选择生活提供了前提条件。与上一代人相比，不论是农村还

是城市的95后，很少有人会有饿肚子的经历，他们是真正物质丰盈的“小康一代”，对贫苦生活没有切身体悟，职业与工作的生存工具属性弱化，他们得以抽身追求更自我的东西。

而且，因为原生家庭本身就不错的物质条件，95后不需再承担光耀门楣、反哺家庭的重任，以往那种憋着要争一口气的心态消失，上大学成为一种人生经历，找工作是为自我实现，“为兴趣爱好而付费”也就顺其自然。

95后一代具有的性格特征，恰也与国家发展进程同步。正是国家的进步，让年轻人拥有了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可能，从行为

模式到思考方式都更为多元活跃。将目光拉远到中国近代百年，可能这一代人恰是少有的从物质到精神都为充裕的一代。他们为“兴趣爱好”而选择工作，选择生活的地点与方式，无论如都是社会进步的标记。他们是幸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令人欣慰的，轻松自如的生活心态，恰也是不断进步的国家应当提供给国民的。

“兴趣一代”的到来，让社会呈现更为丰富多彩的一面。他们为兴趣而生活、奋斗，这非但不消弭斗志，反而让这个社会更有活力。

(作者系新京报评论部记者)

乡村春晚：感知乡土中国的文化脉动

据报道，近日，浙江丽水龙泉举行了2018“乡村春晚大集”，会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乡村代表队，全都是由农村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

在浙江不少地方，办一台乡村春晚，成为当地农村过年的“标配”。不少传统的文化和非遗项目，经由“村晚”舞台，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像“村晚”这样

的活动，在满足群众多元文化需求的同时，也不断用优秀的传统文化、积极的先进文化去浸润、引领群众，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乡村文化生态、村民生活习惯。透过“村晚”这方小天地，文化走上舞台正中央，发挥着在振兴乡村中的特殊作用，带动当地拓展全域旅游，探索农村经济增长的新模式。让农村

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村晚”这样的文化载体，应发挥更大的功能和魅力。

(原载于人民日报评论公众号 作者:江南 摘编:刘昀昀)

高校“要分过年”之风当休

每到学期末，高校都会出现学生向老师要分的现象。据报道，上周，1981所高校在校生活参与的一项调查显示，35.4%的受访在校生承认自己向老师要过分。

“要分过年”之所以大行其道，无非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高校期末考试基本是科任老师的“自留地”，评判标准和评分程序等自由度较大；第二，要分与给分属于一种“封闭式合谋”，要分的学生不会自己举报自己，随意给分的

老师更不会自己跟自己较真。这种“要分过年”的不公正之风，还可能衍生出权力腐败之风，需要靠制度调查来纠偏。要分者，一票否决；查实者，一律处理，加大期末试卷抽查力度，科任老师自然就不敢“高抬贵手”了。总之，高校“要分过年”之风当休矣。这个“休”，要“休”在地，评判标准和评分程序等自由度较大；第二，要分与给分属于一种“封闭式合谋”，要分的学生不会自己举报自己，随意给分的

建设 (原载于四川在线 作者:邓海 摘编:刘朝)

